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奥巴马：习近平有魄力

据《美国之音》新闻网站 2013 年 6 月 18 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今日在美国公共电视的访谈节目中表明，他和习近平在有关中国对美国的网络袭击议题上，有非常直率的沟通。他认为习近平主席是有魄力的人。据悉，在美国公共电视网星期一播出的名人访谈节目“查理·罗斯秀”(The Charlie Rose Show)中，奥巴马和主持人查理·罗斯进行了 45 分钟的访谈对话，其中有大约 8 分钟的话题与中国有关，包括他一周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州的会谈，他对习近平的印象，对美中关系的前景看法，以及朝鲜问题和对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等。对于网络安全问题，奥巴马表示，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小，他与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有直率的讨论，他相信习近平非常了解此事对美中关系的负面影响。奥巴马还说，他和习近平的非传统会面，让两人得以进行坦诚的对话，他对习近平的印象是和以往中国领导人相比，习近平更为年轻、有魄力、有活力和自信。此外，针对朝鲜问题，奥巴马认为他和习近平的对话比以往更为有用，现在北京当局已开始认真看待朝鲜的挑衅言论，也有兴趣和意愿开始和美国进行战略性的对话。他还表示，他要和习近平建立一种让美中两国能够合作的关系，否则若双方的健康竞争变为冲突，那么他和习近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就等于是背叛了自己人民的利益。奥巴马说，他对美中关系的未来感到乐观，但也认为美国必须坦诚、明确地坚守美国价值。

美：若谈无核化须以朝鲜认真为前提

综合国外新闻媒体 2013 年 6 月 17 日报道，本月 16 日，白宫幕僚迈克多诺(Denis McDonough)就朝鲜日前提议与美召开高层会谈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一事，表示乐于见到这一情况，但他还表明朝鲜必须先停止核计划，并说朝鲜不可以以此会谈为借口摆脱国际制裁。据悉，迈克多诺表示，协商一直是奥巴马政府“偏好的结果”，但这样会谈的前提必须是认真的，且需要“建立在朝鲜遵守自身义务的基础上”。迈克多诺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政论节目“面对全国(Face the

Nation)”上，被要求就此事做评论，他说：“我们将依据朝鲜的行动作论断，而不是言语。”迈克多诺说，归根结底，朝鲜无法因为召开会谈摆脱掉目前所受的重大制裁，而俄罗斯和中国也支持这些制裁。

美媒：台“驻美代表”金溥聪接受美媒采访谈美中关系

据《美国之音》新闻网站 2013 年 6 月 19 日报道，台湾“驻美代表”金溥聪 19 日接受了美国之音 VOA 卫视《海峡论谈》节目专访，他谈到台菲之间的外交危机以及刚刚结束的美中领导人峰会。针对奥习峰会，金溥聪表示希望过去几年来两岸和平的互动能够继续采取双方人民都可以接受的方式保持交流。至于奥习会当中提出美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台美之间的关系会不会造成影响时，金溥聪谈到他认为美中台各方不是零和游戏，他表示，只要不损及“中华民国”的利益，我们很乐意见到美中双方有更多密切的互动，这有助于区域和平，台湾乐观其成。

斯诺登引争议 美民众看法分歧

综合国外媒体 2013 年 6 月 18 日报道，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今天公布一项民调显示，过半美国民众认为，涉及泄露国家机密的斯诺登应由法院起诉，不过仍有近 4 成受访者反对美国政府的监视计划。《今日美国》(USA Today) 和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公布联合民调指出，54%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斯诺登 (Edward Snowden) 应由法院起诉、38% 反对。53% 受访者同意美国政府进行的多项监视措施，认为有助于防止恐怖份子的攻击行动，41% 反对。不过美国民众仍对政府是否该监视民众的基本问题持分歧看法，48% 同意政府的监视计划、47% 反对。另外，49% 的受访者认为公布机密文件有助于公众利益，44% 反对，两项问题的正反意见都未过半。相关媒体指出，近期民调数字均显示，美国社会对斯诺登引起的争议看法不一，同意与反对声浪旗鼓相当，这是美国奥巴马政府至今仍不提出该话题的论述并将其公之于社会的原因。皮尤研究中心“大众与媒体”主任狄默克 (Michael Dimmock) 表示，美国民众恐怕不喜欢遭到监控，特别在人身自由与隐私方面，但愿意给予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空间。斯诺登近日继续透过英国卫报 (The Guardian) 爆料，指出美方于国际场合监控各国外交人士，他在网络文字中强调，与中国政府没有接触。据悉，这项民调于 12 至 16 日以电话访问进行，1512 名美国成年受访者通过手机和家中电话完成访谈。

弗勒曼任美新一任贸易代表

据路透社新闻网站 2013 年 6 月 20 日报道，美国参议院今天压倒性通过白宫国际经济事务顾

问迈克尔·弗勒曼（Michael Froman）出任美国贸易代表。他将负责处理美国与亚洲、欧洲两大贸易谈判，媒体预测他将面临众多挑战。据悉，弗勒曼与奥巴马熟识已久，过去4年担任白宫经济顾问期间，在塑造美国贸易政策上扮演重要角色。在这任命项通过几天前，奥巴马与欧洲联盟（EU）多位领袖同意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展开对话，该项协定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弗勒曼如今可能主持第一回合谈判，预计7月8日在华盛顿举行。媒体评述说，美国目前也和日本及亚太其他10国展开自由贸易协议，亦即“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希望能在今年底完成谈判。媒体认为，弗勒曼的政绩，将取决于能否完成这两大谈判，并获得国会支持。为确保达成亚太贸易协议，并为美国商界与农民赢得新的出口机会，弗勒曼可能必须采行艰难的政治抉择，包括扩大汽车、乳制品、糖与织品进口。弗勒曼上任初期也将面临国会考验，必须让“促进贸易授权法案”（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获得支持。这项法案在过去连许多民主党议员也反对。而改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也是弗勒曼的挑战之一。美中贸易赤字2012年创下3150亿美元的新高，庞大数字引发国会忧心。此外，印度限制美国产品进口，加上撤销某些波及美国药厂的专利保护措施，也让许多美国国会议员颇感受挫。这也是弗勒曼未来的一大挑战。

美候任助卿称不接受中国就南海问题双边谈判

据多维新闻网2013年6月23日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针对提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拉塞尔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举行了提名听证会。会上，拉塞尔（Daniel Russel）称，在南海问题上应该有一个双方自愿包容的过程，美国不接受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方要求仅仅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端。双边会谈应该作为解决争端机制中的一部分。拉塞尔指出，美方认为，针对南海争端展开的谈判不仅应该是友好、外交层面的，更应该基于国际法。美国呼吁南海争端各国对各自呼声作出澄清，表明他们将遵循海洋法。拉塞尔称，同时美国认为，除了岛屿归属和海岸线划分之外，争议国应在南海行为规范上展开更广泛的外交谈判。此谈判对南海问题至关重要。美国全面支持东盟超越2002年南海行为宣言。拉塞尔指出，除了“硬实力”之外，美国在再平衡中应当发挥经济、教育和美国价值观等“软实力”。从长远来看，这些软实力会对亚太地区新兴的活力区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称，他将在再平衡中寻求“再平衡”。

美媒：奥巴马支持率暴跌 过半美国人称政府太强大

据CNN新闻网2013年6月17日报道，该报通过电话的方式，在6月11日至6月13日之

间，询问了超过 1000 名美国人做了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上个月奥巴马的支持率已经下降至 45%。这是奥巴马总统一年半以来的最低支持率。该调查就美国政府监视美国人、美国国税局针对保守团体展开不当审查、美国政府窥探记者通讯记录等问题，以及美国政府在处理美国驻利比亚外交机构受到攻击时的方法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奥巴马总统生涯中，第一次过半民众表示不相信奥巴马的诚信，并称奥巴马不值得相信；54%的人称他们对奥巴马的工作方式不赞同。该比例较上个月上升了 9 个百分点。CNN 民调主管霍兰德（Keating Holland）称，奥巴马在 30 岁年龄段民众中的支持率下降了 17 个百分点。这个年龄段的美国人和美国黑人曾是奥巴马阵营最忠诚的支持者。独立选民的支持率从 47% 下降到了 37%。独立选民的反对率上升到了 61%。霍兰德指出，国安局的秘密监听项目及美国国税局针对保守团体展开不当审查等丑闻损害了奥巴马的形象。近来公布的一些其他的关于奥巴马总统民意调查显示出了不同的结果。盖洛普和拉斯穆森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大多数选民不满意总统的表现；但是，在《时代》杂志的一项民调中，支持奥巴马总统的人数比不支持他的人数多。

美国国务院陷“调查门” 奥巴马或受牵连

据《国会山》2013 年 6 月 13 日报道，据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监察部门泄露的报告显示，国务院可能干涉了至少 8 起外交安全服务调查案件，其内容包括国务院官员招妓和滥用职权。涉案人员包括一名大使。在致克里（John Kerry）的信中，罗伊斯（Ed Royce）表示，对国务院政治干预调查深感忧虑。罗伊斯称，这些案件如不由外交安全部门彻底调查是不可接受的。罗伊斯要求克里在 6 月 25 日之前向外交事务委员会说明国务院政治干预调查是否属实，若属实，他要求克里尽快提供干涉调查官员的名单，并对此给出简报。泄露的报告特别指出，美国国务院前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和幕僚长米尔兹（Cheryl Mills）曾要求停止对奥巴马任命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的调查。由奥巴马提名的驻伊拉克大使麦格克（Brett McGurk）因桃色风波自动放弃该职位。报告还指出，负责管理的副国务卿肯尼迪（Patrick Kennedy）曾下令停止调查奥巴马竞选筹款人古特曼（Howard Gutman）招妓事件。报告称未确定身份的国务院官员也曾要求停止对前国务卿希拉里保安团队的几名成员在国外因公旅行期间嫖妓的调查。

英媒：美国和欧盟开启贸易协定谈判

据英国《金融时报》新闻网站 2013 年 6 月 18 日报道，奥巴马总统宣布，关于一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谈判将于下月在华盛顿开始。尽管欧盟领导人坦承，谈判将是“艰难的”，但

他们相信，谈判可在两年内完成。奥巴马敦促政界同僚“超越各种狭隘的关切，关注大局”——因为这将是一项覆盖一半全球经济总量的贸易协定。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宣称，美欧贸易协定对欧盟的价值将达到 1000 亿英镑，对美国的价值将达到 800 亿英镑，对世界其余地区的价值将达到 850 亿英镑。奥巴马希望扩大欧盟市场对美国企业的准入将提振出口，在不增加预算赤字的情况下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此举还将有助于化解这样一种批评，即美国在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之际忽略了欧洲的传统盟友。但美国政府仍担心，该贸易协定的覆盖范围将在谈判过程中大幅收窄，因为欧方可能剔除一些特定行业，从而局限贸易协定的经济影响力。在欧盟和美国努力应对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之际，欧盟与美国的贸易协定被标榜为重振这两大经济体的代价不高的方式，以及为跨大西洋关系注入新的推动力。据该媒体称，欧盟和美国联合的商业实力，也将让它们可以抗衡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

重点关注

充满可能性的中美两国前途

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庄园峰会定义了一种新的合作方式，两位领导人彼此也增进了了解，并打算在新的框架内处理双边关系，着力避免对抗。此次峰会虽然貌似简单，但很及时。领导人之间建立友谊非常重要，这种轻松交谈的方式很不错，最好能走向常态化。

不过，轻松交谈的背后却是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其中包括两大战略问题：首先，全球一体化和核武器是否使大国之间不敢轻易言战？其次，中美两国能否适应新形势下各自承担的角色？目前，美国的国力依然首屈一指，而中国通过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并以此享用“免费搭便车”的服务。

中美两国试图在大国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合作方式，以避免冲突，适应新形势下的大国关系。但中美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如：网络安全、东亚局势、全球贸易、汇率，使得这种新的合作方式说易行难。

新型大国关系

在此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表示“中美两国必须要找到一种新的合作方式，以避免历史上大

国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其实，习近平主席只是在重申以前的观点，2012年2月，他访问美国时就表示希望建立“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的政策专家都热衷于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希望中美能以此作为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甚至也能应用于其他国家。在目前大国之间缺乏信任但又互相依赖的情况下，这种观点是一厢情愿，还是想淡化自己的战略意图？借用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话说，“那里存在那里吗？”

这种观点的背后潜藏着对一种趋势的担忧，即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和竞争不会持续：要么继续合作，要么走向全面竞争，二者必选其一。不过，从好的方面讲，新型大国关系可以让某些事情得到模糊处理；从坏的方面说，它只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对于中国的官员和分析人士而言，新型大国关系似乎是“和平崛起”提法的替代者。无论怎么说，其实质都是新兴大国不会挑战，甚至颠覆现有国际秩序。说白了，中国不想被其他大国视为1914年一战爆发前的德国。

中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常常在公开场合向美国施压：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断绝和达赖的交往、不要实行亚洲重心战略，这样，中美之间才会有新型大国关系。不过，由于两国之间缺乏信任，而且某些共同的目标又非常模糊，新型大国关系似乎很难建立。

其实，不管未来如何，就目前而言，中美关系和其他大国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自从四十多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两国之间的交往一直比较积极，美国让中国进入全球体系，两国在某些重大问题上都试图求同存异。

独特的双边关系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到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两国会开战吗？我们很难找到类似的大国关系：文化和政治制度相差巨大，但经济联系紧密，同时又是战略上的对手。虽然中国经常抱怨美国的遏制政策，但中国从目前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获益良多。美国凭借军事优势保持东亚的和平稳定，而中国经济总量也从1980年的2020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7万亿美元，在此期间也先后加入了世贸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大型国际组织。

和1914年的形势相比，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核武器。虽然大国之间有时会吵吵嚷嚷，但要谈到冲突，就不得不考虑风险和成本。从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美苏之间始终没有大动干戈，而只是在暗地里较劲，原因之一就是担心互相毁灭。

不过，中国军事实力一直在进步：源自国内的黑客攻击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网站、海军和核力量不断充实巩固、军费支出连年增长。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上的举动引发外界猜测其真实动机。虽然中国声称菲律宾、越南、日本侵占其岛屿，但其所作所为让人感觉是想推行“门罗主义”。

打破平衡

中美能否继续合作主要取决于两大核心议题——网络安全和东亚地缘政治。此次峰会在这两个问题上似乎没有进展。在网络安全方面，尤其是中国被指控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用即将离任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的话说，该问题是“两国关系的核心”。奥巴马总统向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此问题不解决，两国将难以保持友好关系，不过目前双方只是同意就此问题展开谈判。

关于东亚局势，此次峰会上，双方都认为应采取措施让朝鲜弃核。在今年初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之前，中国是朝鲜唯一的盟友，比起核试验，中国更担心朝鲜发生动乱。一旦中国意识到朝鲜是个累赘，那么自然会着力促成解决核问题，以清除该地区最大安全威胁。

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可能会重新评估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亚洲重心战略。之前，中国将美国海上平衡战略和遏制政策混为一谈。相信过一段时间之后，中国也会默认美国在某些水域的军事存在。对于美国而言，两百多年来，一直追求自由——海上、商业、网络、空间。

中美两国必须得回答困扰双边关系的问题。两国要通过不断协商找到利益平衡点。答案可能不太令人满意，但要直面现实。

本文作者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2001年至2004年，曼宁担任美国国务院的高级顾问，2004年至2008年任政策计划工作组成员。

（文章来源：2013年6月《国家利益》期刊网站）

美国迎来了难得的喘息机会

美国目前在外交政策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喘息契机——暂时脱离艰难的外交常态，让我们可以对国内外局势作一番清点。说我们正处于平静期似乎有些奇怪，因为美国面临很多问题——叙利亚内战，伊朗似乎正在寻求拥有核武器，不负责任的朝鲜已经拥有核武器，恐怖分子的持续

威胁，中国的崛起以及急剧的气候变化。但美国仍然获得了喘息契机。在长达三个半世纪的现代国际社会时期里，大国几乎总是面对一些决心要打败他们、努力按照自己意愿调整国际秩序的对手。这样的历程在上个世纪出现了三次，带来了暴力的、代价高昂且充满危险的结果，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

如今，我们仍然面临威胁，但它们往往是地区性的，短期内无忧的或者规模有限的威胁。全都没有上升到全球性的、紧迫的、事关生存的级别。美国目前没有大国对手。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将一直如此。美国面临的最大的战略问题是如何延长喘息时间，而不是浪费这个机会。我们需要限制干预他国的行动，恢复国内力量。我们不能再试图重建中东及东南亚的国家，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付出很大代价，但收效甚微。

相反，我们必须重振美国经济，这不仅会提高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还能创造令潜在对手望而生畏的资源，让他们不敢贸然走向对抗之路，如果它们仍然选择对抗，这也能带来应对策略。奥巴马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主要依靠这种思维，特别是对大中东地区采取了克制策略。但处理国内问题时，这个政府表现较差，经常在推动急需的改革时畏首畏尾。

但美国是“不平等中的上等”(first among unequals)。美国的领先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的固有优势带来的结果，这些优势包括政治稳定、健康的人口结构，以及对法治的坚持。我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能源、矿物、水资源及可耕地，我们对移民的开放程度较高，他们为创新工作做了大量贡献。我们有优秀的高等教育机构、风险投资机构，以及允许失败后获得第二次机会的法律体制。与邻国的友好关系使我们能够重点考虑针对更远地方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像大多数国家必须做的那样，关注边境问题。在当今时代，其他主要大国——中国、俄罗斯、欧洲、日本及印度——中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冒险挑战美国的领先地位。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至少是中国的六倍，美国在国防方面的投资高于排在美国后面的 10 个国家的投资总额。

此外，很多可能成为未来竞争对手的国家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进入美国市场、获得美国技术、商品及服务的机会。它们不见得总能认同美国，但也不认为美国是一个绝对敌对的国家，或者是阻止它们完成核心目标的障碍。这些国家通常全心关注并受制于国内的经济、社会及政治问题。中国是人们最常提到的潜在威胁。但是，经济增速放缓、腐败无所不在、普遍的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及头重脚轻的政治体系都对美国形成了制约。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更倾向于融入当前的国际秩序或其类似体系，而不是去推翻这种秩序。他们对融合而非革命更感兴趣。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这种情况而自鸣得意，也不能因为自己的领先地位而为所欲为。喘息从定义上看就是暂时性的——暂时偏离历史进程，而不是历史的终点。它使我们得以转移重心，而

非撤离历史舞台。在海外，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美国拥有最大利益以及我们目前所有的政治工具——军队、援助、贸易和外交——能够获得最多好处的地方。这意味着要减少如 2003 年入侵伊拉克和 2009 年袭击阿富汗之类的主动选择性战争和重塑社会的大规模行动。它也意味着不能对叙利亚目前的内战进行直接武装干涉。对于伊朗，我们要强调外交、制裁和其他手段，而不是用武力来劝阻它跨越核武器门槛。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加强保持亚太地区稳定的工作。本世纪的几个大国极易在这片地区发生冲突，而美国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工具也能够很好地保证这种冲突不会发生。适当加强美国空军和海军在这个区域的力量不仅能让日本和韩国等盟友感到安心，还能含蓄地向中国和朝鲜发出警告，而且我们还能通过外交手段表明欢迎中国加入新的地区贸易协议，降低各国关系恶化的可能性。

在国内，我们还必须修复美国力量的基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甚至不需要更多的花费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投资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往往较小。美国在公民人均医疗保健上的开销几乎是其他工业国家的两倍，而且其结果也通常更糟。我们用于每名学生的教育支出也比大多数其他富裕国家要多，但却收效甚微。吸引最优秀的教师，对他们的成功予以回报，以及使家长和学生能够选择适合的学校，都能够使资源得到较好的利用。在政府资助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促进公私合作，来重建国内经常濒临崩溃的基础设施，重新制定移民政策，使更多拥有高级和必须技能的移民能够优先获得签证和绿卡。此外，减少长期的福利项目负债，降低公债在 GDP 中所占比例。这些举措再加上个人及企业税改革，就能促使美国的经济增长恢复到与二战后大部分时期相当的水平。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实行孤立主义。相反，这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崭新的大战略，它把国家安全视作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一个变量。有人说危机的价值很高，我们决不能浪费。喘息机会也是一样。

（作者：理查德·N·哈斯/Richard N. Haass 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文章来源：2013 年 6 月 25 日《纽约时报》）

《金融时报》：中美需化解“凉战”

在北京，分析人士仍无法准确地定义中美关系的现状。其中一人最近对我说：“不是热战，不是冷战，而是凉战。”

领导人、外交家和分析人士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无法对中美关系下一个简单的定义。目前各方给出的定义五花八门，从“战略接触”、“战略合作”和“战略竞争”，到“作为负责任全球利益相关者的中国”。这些定义的问题在于，它们对中国人几乎毫无意义。如今，切中中美两国政府要害的一个说法是“战略信任赤字”，指的是存在于中美之间的隔阂。如果不加遏制，这种隔阂可能破坏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信任赤字”对中美双方都是个隐患。网络间谍和网络战，海空军重兵部署的中国东海和南海紧张局势日益升级，朝鲜半岛局势日益紧张，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在叙利亚问题上陷入僵局，这些问题都反映出中美之间存在“信任赤字”。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举行的工作峰会之所以意义重大，原因就在这里。在此之前，中美之间不存在一种政治高层对话机制，来解决这些以及其他明显对地区和全球秩序构成挑战的棘手问题。中美首次元首峰会（以及预计以后还会陆续举行的此类会晤），终于让双方得以构建一种这样的机制。事实上，除非中国国家主席本人（同时也是中央军委主席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亲自与美国总统进行谈判，否则，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将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美国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有权在谈判中提出战略主张，但中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连中共的头 250 号人物也排不上。中国只有国家主席（在与其他 6 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商之后），才可以在真正重大的问题上提出主张。尽管在各自的政府内都面临阻力，但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都决定，打破过去 40 年间主导中美关系的外交惯例，举行一次工作峰会，摒弃元首访问中常有的隆重仪式。这本身就是一次胜利。更重要的是，中美双方私下里都对首次元首峰会的氛围、交流深度和内容感到满意，都没有期望峰会能够交出一份“成果”清单。在场者中没有人视此次峰会为“网络战问题峰会”——如美国媒体所说的那样。

那么，峰会有哪些成果？首先，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双方同意在两国军方之间建立一种常规对话机制。这可能有助于建立网络安全的“交通规则”，有助于朝鲜半岛的危机管理以及海洋和空中意外事件的管理，同时也有助于建立一种机制，帮助亚太地区增进基本信任、完善安全构建举措。其次，此次峰会标志着中美两国首次就朝鲜的未来展开系统性交流和协调，包括报道中提到的双方就防止朝鲜政府制造出核武做出公开承诺。第三，双方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了协议，这可能标志着双方已开始采取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促使规则在全球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的政策不可能很快改变。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很多。然而，如果没有一种双边工作峰会机制，解决重要战略问题基本无望。在苏联解体前的 20 年里，苏联的威胁是中美合作的深层次原因，苏联解体后，这一威胁消除，中美关系经历了无所建树的 20 年。此次峰会可能标志着两国关系改善的新时期的开始。中美关系原本正在朝战略竞争（乃至更糟糕）的方向发展。而如今，

中美有可能得以构建一种足够互信的关系，创造一种框架，来应对两国在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全球问题上，面临的各种日趋复杂的挑战。此次峰会甚至有可能在未来促成习近平本人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关系不会愚蠢地重复过去几百年中大国势力此消彼长的血腥历史。

(文章来源：2013年6月17日《金融时报》)

(新闻部分编译：梁辰、刘振宇、王子磊等)

焦点分析

中美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提出美中“大交易”论

尽管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南加州见面时洋溢着合作的气氛，但现实并不那么乐观：崛起的中国不论在政治、军事，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对美国形成相当大的挑战。一些学者为美中如何避免历史上“霸权过渡”时期的灾难性冲突重演提出各自见解。

近半年来，中美关系学界出现了以比较历史的方式分析当前中美关系的现象。一些学者回顾历史上因权力平衡变化而导致的种种灾难性的冲突，担心正在崛起的中国和仍为世界强权的美国彼此间的焦虑或导致灾难性的历史重演。

中美关系面临“修昔底德陷阱”？

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近期谈论中美关系时，曾以古希腊的“修昔底德陷阱”来比喻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危险。这个历史典故指的是实力上升的雅典对此前绝对强势的斯巴达构成挑战，新兴大国最终与守成的大国兵戎相见

而在经济方面，也有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

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济合作的崩溃导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经济强权为鉴，告诫当前的中美关系或许会导致相似的结局。

在华盛顿重要经济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近日举行的一个政策报告发布会上，该所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就将奥巴马和习近平在经济方面面临的挑战称作“金德尔伯格难题”(Kindleberger Conundrum): 参照历史上的强权更迭，如今国力上升的中国或许不愿意维持战后美国建立起来的开放型、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多边经济体系；而当今的强权，也就是美国，则难以只手撑起这个体系。

萨勃拉曼尼亚：如何应对“金德尔伯格难题”？

就此，萨勃拉曼尼亚开出了一剂以权力交换维系现有体系的“药方”。

他说：“我的建议要探讨的是，美国是否能够和中国达成一个以权力换取目的的交易(Power-for-Purpose Bargain)? 实际上就是，美国在现有的多边体系和多边机构中放弃部分权力，中国则增加在其中的利益，以此维系和加强现有的开放型体系。”

萨勃拉曼尼亚说，中国是这个开放型全球经济体系最大的受益者，但它一直对美国自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现有体系心存不满。他举例说，美国对于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中的话语权仍有疑虑；而中国则搞出一个与世界银行相并行的金砖国银行。

萨勃拉曼尼亚说，在战略安全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军事雄心及其网络间谍活动感到不安；而在经济方面，美国的不信任感来自中国的重商主义汇率政策、封闭的金融和外汇体系、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纵容，以及持续蔓延的国家资本主义。他说，在美国看来，中国是开放体系的受益者，但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不愿开放自己，因此无法承担全球领导者的角色。

这位印度裔经济学家说，美国对中国在贸易方面的不信任感，表现在它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TPP)自由贸易谈判。他认为这个多边自贸谈判对中国有歧视。

以分权维系现有秩序的美中“大交易”

萨勃拉曼尼亚的提议具体包括：在 IMF 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中增加中国的话语权；而美欧，尤其是负债累累的欧洲，则不应在这些机构继续享有否决权。他说，美欧即便继续享有否决权，也应该赋予中国同样的权力。在贸易方面，他认为美国应该停止推动 TPP，而将精力转向推动由

世贸组织牵头的自由贸易协定。

对于中国而言，他认为这个新兴大国需要大幅度提高它对 IMF 这样的机构的资金支持，以增强抵御全球经济震荡的总合力。萨勃拉曼尼亚说，中国自身也要积极开放其金融和汇率市场，减少国家资本主义，进而消除美国的疑虑。

因提出“软实力”概念而为人熟知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席间评论了萨勃拉曼尼亚的这份政策建议。

约瑟夫·奈：比较历史的误区

约瑟夫·奈首先谈到以比较历史的方式分析当前美中关系应避免的误区。他强调说，将现今强权政治与过往历史进行比较时，应当兼顾古今境况的异同。

约瑟夫·奈曾在 15 年前就曾以“修昔底德陷阱”诠释现代政治学中的“霸权过渡”(hegemonic transitions)理论。他说，以该理论分析当前美中关系，如果不考虑时机和整体境况，很容易陷入误区。

他说：“如果你通过修昔底德的教训对‘霸权过渡’作仔细探究的话，你会认识到那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而是因为修昔底德反应过度所致。其次，人们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鉴时，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德国其实在进入 20 世纪时，其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英国。而如今的中国并不会以类似的方式超越美国。”

约瑟夫·奈在 6 月 12 日刊登于《洛杉矶时报》的评论中说，尽管中国很可能在今后十多年时间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但美国在军事实力和“软实力”上的优势，仍将维持至少数十年。

美国在军事和“软实力”上仍有绝对优势

这位政治学者同意应当将中国纳入现有的多边机构。他说这其实是正在发生的事，而促使中国融入多边机构的并非外在压力，而是中国内部变化使然。约瑟夫·奈认为，鉴于美国在实力上仍具有优势，这个强权不必急于割让权力。

他说：“我们不必在放弃权力方面操之过急，或让步过多。要看到两方面的事实：一是美国并没有衰退，至少我不相信有这回事；其二，谈及将其纳入多边机构，其实中国正在朝向与我们的利益相符的方向走。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盟国的安全问题上。”

奈：美国不必急于分权

约瑟夫·奈对于萨勃拉曼尼亚提出的“大交易”(Grand Bargain)中有关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中的地位，以及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看法基本赞同。但是，在贸易政策，尤其是关于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PP)方面的看法则有不同。

他认为，有竞争力的地区或者竞争开放事实上对于贸易自由化是有利的。约瑟夫·奈说，如果从长远看，美国在 TPP 方面对中国持开放态度，那么即便中国不会在短期内加入该协定谈判，也会向大的构架方面靠拢。再者，他认为不必为了推动全球自贸协定而放弃地区性自贸谈判，因为同时推动两者并不矛盾。

约瑟夫·奈在《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文章中提到，奥巴马政府的 2010 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已经提到美国必须以正和(positive-sum)而非零和(zero-sum)观念看待中国的崛起；也就是说，中国国力的提升，有时候对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是有益的。

约瑟夫·奈认为，要避免灾难性的冲突重演，需要对权力，以及权力如何演变进行全方位的清醒审视。他认为，刚刚过去的奥-习峰会是朝这个方向所迈出的一步。

(文章来源：2013 年 6 月《美国之音》网站)

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共同的历史任务

如果习近平在去年访美时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还不是非常清晰，那么，今天中美关系专家已经开始对其进行解释或说明，而两国领袖也愿意以此来形容它们之间今后关系的指向。这至少反映了中美两国都愿意面向未来，以“新型”取代“传统”，尽管什么是“新型”、什么是“传统”都还未作定义。但是，不论对“传统”应该如何理解，都必将激发一种新的历史认识。

如果我们将“新型”作为“传统”的线性发展，认为“新型”取代“传统”只是新思维取代旧思维，那么我们可能还没有充分认识这种“新型”的意义。“新型”和“传统”是平衡的、多元的选项，这种看似先后的行为形态，其实是对世界观的不同选择，是对国际关系价值取向的差别追求。传统国际关系的内涵是权力逻辑、势力范围扩张，以博弈作为平衡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是以利益计算作为分析依据。根据这样的价值认知，传统大国必须尽力避免新兴大国崛起带来的

挑战，甚至不惜一战，以此作为行为准则的国际关系只能够强调零和思维以及寻求对有限资源的自私占有。这样的认知对于曾经是历史上最富经验的强国来说并不陌生，但无法满足这个即将复兴的大国的政治主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

对中国和美国的“大”为什么需要一种新型认识？因为它们之间已经超越了经济规模和军事力量，而是要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高度去反思人类的未来走向。它们要避免的不只是一些争权夺利的战争和经济利益博弈的伤害，不仅要从生存的、环境的、文化的、精神的角度，而且还要从国与国之间如何建立合作互助以及文化共融来认识。从这种层次去探讨，才能认识到中国和美国对相互关系进行新型认识的独特意义，至少是在两种人文关怀的路径上进行选择和比较的意义，是对中西方不同文明选择的意义，这不只是中美两国文明发展所需，更是人类文明发展所需。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够从这个高度去自我期许，那么这个“大”又何从说起！

“新型大国关系”如何从屡战屡败的“干预治天下”过渡到具有中国智慧的“仁义服天下”，使目前的国际关系处理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面临的重要历史任务。几百年来，国际关系基本都是在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下进行调整，强权政治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中国必须反对这样的传统。虽然中国必须同样以实力说话，但却要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超越“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的大国发展老路，为国际关系的变革提供新思路、新理论。我们希望未来的国家关系（不仅仅是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应该从打破强权政治、构筑新国际观开始建立，中美两国领导人应该具有，也必须要具有这样的魄力和认识。

相较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使用的是“新型合作模式”一词，体现了中美在“新型大国关系”认识上的微妙差异。一边是中国更加强调不对抗、不冲突的平等合作关系；另一边是守成大国心怀戒备，对中国实施的是两手政策，一方面它在双边、地区和国际等问题上与中国积极合作，但另一方面，它又试图以多种方式制约中国的崛起，唯恐中国挑战到它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然而，新型大国关系下的中美关系既是双边的，也是区域的，更是全球的。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中国已经不断发展自己，积极参与体系，并希望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共同致力于对体系的改善。而且，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共同管理来面对，而中美合作对全球管理则至关重要。尽管两国之间还有竞争，但共同的利益则更大。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科恩（Thomas S. Kuhn）在寻找科学发展轨迹的时候，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这种范式也可以在非科学领域里被解释为在特定时期之内人们普遍认定的世界观、认识论、基本原理、范例和方法。在科恩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尝试将世界政治格局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转变定义为一种范式的转变。这种范式的转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就是为转变所

积累的能量已经到达某个临界水平；第二是转变的条件已经被注意和认识到，也就是说至少一部分人已经能够认识到，前一种范式和后一种范式之间的差异已经无可避免，触动这种范式转变的因素也渐趋成熟；第三是存在着对这种转变给予关键一击的领导者或领导集体，他们将能够肩负起触发这种转变的政治魄力。

对于第一项条件，从过去三十年世界格局的变化向我们预告了这个世界正面对二战以来最大的结构挑战。作为第二项条件，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盘剥、无序的发展，以及资本扩张所制造的世界性贫富差距，都预告了我们必须重新搭建人类的发展模式。一个更能够持续和与自然更为友好的方法，一个能够让各个参与者和谐共存、合作共赢的政治格局，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协商的议题。对于第三点，这可能是范式转移的最大挑战，因为它要求现代的政治家去宣告大部分公民都还不习惯的政治倡议，这并非是他们喜闻乐见的任务。只有依赖少数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不然占据主流地位的民粹政客将无法完成范式转换的艰巨任务。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转移从来就不是机器或学术争论的结果，而是当代领导人所要承担的艰巨任务。从“新型大国关系”到“新型国家关系”的认识普及是个长期的过程，中美双方根据习近平主席的倡议能从两个“大国”之间开始致力于“新型”国家关系的建设已经是个了不起的伟大尝试。具有模范意义的、以中美关系为主轴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是否能够成功，显然离不开中美领导人的卓有成效的领导力。这次加州庄园会晤至少给了我们一线希望，这两位“年轻”的领导者，看来已经具备了必需的政治远见和良好愿望，认识到需要透过他们这一代去打破成规，选择一种“新型”关系，以一种新思维和眼界去审视未来。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引领自己的人民，走向一个崭新的世界。

（牛俊供稿）

本刊编者注：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主编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